

李喜所 元 青著

梁 启 超 传

李喜所 元 青著

梁启超

传

K82

272

0029173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吴玉萍
装帧设计：王师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传/李喜所 元 青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

ISBN 7-01-001515-5

I . 梁…

II . ①李…②元…

III . 梁启超-传记-中国

IV . K827.5

梁 启 超 传

LIANGQICHAO ZHUAN

李喜所 元 青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375 插页 3

字数：480 千字 印数：4,001—6,000 册

ISBN 7-01-001515-5/K·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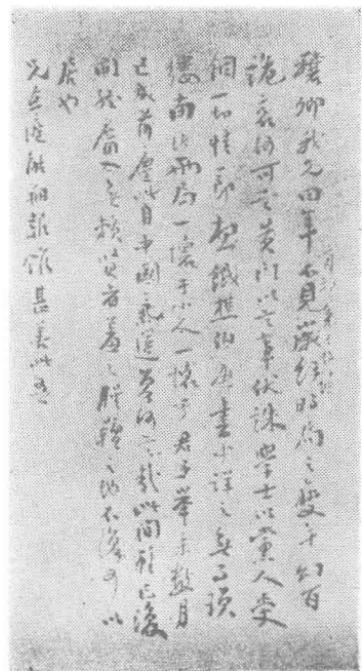
定价：32.00 元



1898年戊戌维新时的梁启超



▲新民丛报第一号封面书影



梁启超书札手迹



1924年梁启超(左三)与印度
诗人泰戈尔合影



梁启超
55岁像



56岁的梁启超



1914年进步党要人合影(前排左起第四人为梁启超)



护国战争中任两广都参谋、军务院政务委员长的梁启超(左)
和两广都司令、军务院抚军副长岑春煊



梁启超1900年摄于澳大利亚



梁启超(前)和汤觉顿
流亡日本时合影

引　　言

——我眼中的梁启超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自觉不自觉地塑造自己的形象。令人玩味的是，人类如此众多，却绝难找出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因而，绝对准确地去描述任何一个人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讲不通的。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古人，即使所依据的史料百分之百的准确，由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不同，价值取向有别，学术水平各异，所写出的人物传记也不可能完整无误，更难使古人呼之欲出，形象逼真。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了解和认识是相对的，再现历史人物形象则更是有限度的。尤其是那些历史伟人，性格复杂，活动频繁，思想活跃，智慧超群，后人认识起来就更困难一些。本书的传主梁启超，从1873年出生到1929年谢世，虽只度过了56个春秋，但他11岁中秀才，16岁成举人，25岁和康有为一起发动戊戌变法；29岁主编《新民丛报》，为一代青年创造精神食粮；辛亥革命前后叱咤政坛，组党结社，曾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护国讨袁战争的都参谋等；五四之后又潜心研究中西文化，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地讲学，并写出了第一批学贯中西、令人叹服的学术专著，堪称一代宗师。为如此博学多才又影响深远的大人物立传，其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本书只能是为后来的研究者铺路搭桥，绝不敢自诩为准确无误地再现了梁启超。故戏之曰：我眼中的梁启超。

人在谱写自己历史的过程中，受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关

系、人文景观所制约，在大气候相同的情况下，人的个性就具有决定意义。人物传记首先应是个性化的历史。梁启超一生多欲、多才、多思、多情、多变，争强好胜，从不满足，喜欢并善于表现自己，总想在剧烈动荡的近代中国社会中选择自己的最佳定位，用自己的世界观去改造中国。这种创造型的个性左右了其开拓性的人生。

强烈的欲望是梁启超的人生支柱。他视“希望”为成功之母，总是对他所追求的一切抱定必胜的信念；他把“兴趣”看作事业成败的关键，总是对他所干的一切抱有浓厚的兴趣。受中国知识界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他一生关心国家命运，千方百计在政坛角逐。童年时期，梁启超就有献身祖国的宏图大志，1890年在广州遇康有为后，更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其政治欲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增强了。1902年前后，其思想渐渐突破康有为的框架，自成一体，梁启超改造中国的模式进一步完善。1912年，他结束了14年的海外流亡生活，决心在政界一试其锋。此后的8年中，梁启超沉浮于扑朔迷离的政潮而不能自拔。晚年他虽宣布脱离政界，但从未远离政治，“五四”之后的各种政治风云，梁启超总要指手画脚，评论一番。对于一个潜心学术又在政治上屡遭惨败的文人来讲，始终保持这样饱满的政治热情，是难能可贵的。和政治欲相比，梁启超的学问欲更旺盛。其一生几乎天天在作学问，即使涉足政坛的岁月里，也从未停止发表学术论文。他对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图书文献学、新闻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金融学、科技史、国际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都有一般人少有的兴致，写出了有相当水平的论著。在那精神亢奋的年月，他一天可以写5000多言，一生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巨著。一部《饮冰室合集》，倾注了梁启超刻苦攻读、勤奋著述的斑斑

血泪，也反映了他广博的学术文化知识和高深的学术造诣。梁作学问，一是求新，从不炒“冷饭”，更反对人云亦云，始终选择中西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拥有众多的读者；二是求通，梁无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化和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总是古今中外，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议论风生，给人启迪，其是通才，而非专才；三是求多，总以“不知为耻”，只要梁研究的问题一定要写出论著，其好友曾劝他专精一门或两门，求深不求广，他也知道自己作学问广博有余，专深不足，一度下决心调整战略，但兴趣的广泛，能力的超群，决定了他无法只专一门，而是以多取胜，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个性。梁启超的这种多欲，是和多才、多思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能作出成绩。他天赋好，又勤奋，病危住院，还伏案著《辛稼轩年谱》；他思维敏捷，善于观察社会和探求人生，新思想层出不穷。才、学、识的有机结合，使梁成为著名的思想理论家。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还是一个“情种”。^①他无论从政、作学问，还是交友、持家，一个“情”字贯彻始终。在政治舞台上，其城府欠深，易于激动，知心好友认为他不适合从政，梁开始不服，后来屡屡败北后，也不得不认可。他写文章，笔锋常带感情，富于“魔力”，透过梁创造的活泼流畅动人的“新民体”，可以感触到其跳动的激情。在爱情生活上，梁也一度为窈窕少女的真情所动，但始终坚持中国式的诚挚而一以贯之的夫妻感情。梁对儿女一往情深，关心子女的生活、学习、为人、择业，现存的梁致女儿们的几百封书信，说明他是一位好父亲。尤其对大女儿梁思顺（令娴），梁视为掌上明珠，体现了无价的父爱，真可谓“儿

^① 梁自称：“余生平爱根最盛，嗜欲最多，每一有所染，辄沉溺之，无论美事、恶事皆然，此余爱性最短处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2，第191页）

女情长”。

梁启超“流质易变”，总以“今日之我去攻昨日之我”。他也承认，其师康有为“太有成见”，而他则“太无成见”。有些论者将梁一生归之为“十变”，也有的概括为“七变”、“八变”。总之，梁启超的多变是肯定无疑的。需要探讨的是梁为什么如此多变。不少论者从梁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上去找原因，还有的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去寻答案。理由是，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薄弱，缺少独立意识，其代言人肯定软弱多变；而近代中国又风云突变，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东西，明天可能就过时了，这一时期是新潮为人们追逐，过不了多久就黯然失色而被抛弃，一浪一浪的迅速推进，使总想站在潮头的梁启超不得不变。这种解释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深入一步去看，梁的多变还有深刻的思想和政治原因，特别和他追求的改良主义始终不变有因果关系。梁启超一生要达到的政治目标是：通过改良的方法，设议院，开国会，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实现这一最终目标之前，先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开明专制，通过开明专制达到君主立宪。在表达这一意愿时，梁有时抨击封建专制，呼喊资产阶级民主；有时又哀叹民智未开，为开明专制评功摆好。似乎他一会儿是民主的代言人，一会儿又是封建的卫道士。而且，书生搞改良，只能寻靠山。像梁启超这样的文人参政，无非是写文章，造舆论，办学堂，搞学会，组团体，若要真正实现其宏图大志，必须寻求强有力的实力派的支持。梁戊戌时和光绪等帝党联合，武昌起义后又投靠袁世凯，和袁闹翻后又去寻段祺瑞，待看清楚段的庐山真面目后，梁再也物色不到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强人”了，于是不得不在故纸堆里寻求解脱。梁这样四处寻靠山，自然就变化不一了。从理论上讲，改良本身就是一矛盾结合体。改良主义者一方面要突破旧制度，建立新体制；另一方面又要保留

传统，维护旧政权。在强调破旧的时候，有很大的进取性；在要求保存旧事物、反对革命的时候，又表现出极强的守旧性。所以，只要奉行改良主义，就处于左右摇摆的多变之中。梁一生就置于这种无法自拔的矛盾当中。梁启超改良主义宗旨的始终不变，决定了他实施过程中的多变。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后的所谓“不变”，实际是因为他已不全面坚持他的改良主义目标了，他所梦想的只是拥护光绪帝复辟，延续清朝的统治。至于实现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康有为似乎忘却了。

梁启超的一生是喜剧，还是悲剧？应是喜剧色彩，悲剧性格。他留下那么多的宏篇巨著，领导过戊戌变法，又是民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应该说不虚此生；但他一生所干的事几乎都没有成功，其心境多在愁苦和忧愤之中，晚年目睹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对前途都绝望了。近代中国这个悲剧舞台，决定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决定了梁启超的悲剧性格。一位外国学者称梁一生在政治上和学术文化上画了一个圆，起点也就是他的终点。此话虽难令人信服，但发人深思。

目 录

引言——我眼中的梁启超.....	(1)
一 寻根	(1)
家乡风情	(1)
家世沿革	(7)
家庭素描	(10)
二 流水年华.....	(17)
幼年的足印	(17)
中秀才——乳臭未干	(21)
成举人——翩翩一少年	(24)
三 康门高足.....	(28)
拜师康“圣人”	(28)
新潮激荡的万木草堂	(34)
敞开思想的窗扉	(39)
四 初涉政治舞台	(44)
公车上书	(44)
组织强学会	(49)
《时务报》主笔.....	(53)
执教湖南时务学堂	(61)
联志士，建社团	(67)
五 维新大思路	(75)
讲进化	(75)
开民智	(80)
变科举	(86)

兴民权	(91)
设议院	(96)
六 站在变法的潮头	(102)
维新运动的高涨	(102)
保国会	(109)
全力推进新政	(114)
激烈的新旧之争	(119)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123)
七 亡命与奋进	(129)
忍泪逃出国门	(129)
支持自立军起义	(133)
办学和办报	(137)
“言论界之骄子”	(144)
漫游新大陆	(152)
和孙中山的交往	(158)
八 构筑新文化的新星	(163)
新星的崛起	(163)
政治文化	(170)
经济文化	(179)
法律文化	(185)
宗教文化	(193)
社会文化	(198)
学术文化	(206)
九 死战革命党	(222)
迈向改良的脚步	(222)
政治革命论	(230)
“开明专制”论	(236)
反“社会革命”论	(240)
事与愿违	(245)

十 为宪政运动推波助澜	(250)
立宪运动的兴起	(250)
政闻社及其活动	(253)
宪政运动的灵魂	(262)
关注财政和外交	(268)
十一 武昌起义后的抉择	(274)
新形势·新对策	(274)
初返国土	(282)
中国建设问题	(285)
联袁的前前后后	(292)
结束流亡生涯	(299)
十二 与袁世凯握手合作	(304)
鼓吹“国权主义”	(304)
政团林立中的进步党魁	(310)
入主“第一流人才内阁”	(318)
改革司法	(326)
币制局总裁的苦衷	(330)
袖手旁观	(334)
十三 挥泪反袁	(338)
猖獗一时的帝制逆流	(338)
批评与幻想	(343)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350)
为何要反袁	(358)
十四 护国运动的主帅	(363)
发动起义	(363)
潜入广西	(372)
促成两广都司令部和军务院	(379)
迫袁退位	(384)
结束护国战争	(390)